

病毒性例外的合法性

面對這場疾病，為什麼整個國家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倫理和政治上陷於崩潰？而民眾相當輕易地接受了限制自由的種種措施，嚴苛程度史無前例，即便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未能企及……

黃鳳祝

○（發表短文〈病毒性例外〉，為政府實施例外狀態進行辯護。四月，意大利疫情漸趨平穩，阿甘本又發表了兩篇文章：〈保持社交距離〉和〈一個疑問〉。他在文中指出：面對這場疾病，為什麼整個國家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倫理和政治上陷於崩潰？而民眾相當輕易地接受了限制自由的種種措施，嚴苛程度史無前例，即便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未能企及。在阿甘本看來，通過放棄善來保護善，或是通過強制放棄自由來保護自由，其中的邏輯虛假而矛盾。

阿甘本是海德格爾的學生，主編意大利文版的本雅明文集。他的理論受到本雅明彌賽亞主義和福柯生命政治的影響，代表作有《神聖的人》和《例外狀態》。

裸命

「例外狀態」和「裸命」是阿甘本哲學的兩個重要概念，理論基礎源自本雅明的《權力／暴力批判》和《歷史哲學論綱》。

本雅明把人分為三類：自然人、法人和赤裸裸的人。自然人是帶有原罪的人。為解除自然狀態中人的衝突，自然人通過暴力和契約建立了法制。自然人的原罪（利益衝突）被法律界定為罪責，違法人

隨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多國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通過採取封城令、禁足令、居家令、社交禁令、數字跟蹤等嚴厲的隔離措施，延緩病毒的傳播速度。這些措施在拯救生命的同時，也限制了個人的基本權利，阻礙了生活與工作的正常運轉。圍繞病毒性例外狀態的合法性問題，歐洲哲學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

二〇二〇年二月，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九四二—）在《宣

言報》（*il manifesto*）上發表評論文章〈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

批評意大利政府針對倫巴第大區等地的封城禁令。他對使用例外狀態作為常規政治範式的趨勢表示擔憂。他指出，人們渴望安全，於是接受了政府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讓人們產生這種渴望、並採取措施加以滿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針對阿甘本的觀點，法國哲學家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一九四

為受到法律的懲戒。自然人因制憲而變成法人。法人為了保護利益和社會秩序，分化為兩個對立的群體：主權者和被規範的人。法律建立了社會秩序，但是無法解決人的社會衝突。由於利益衝突，主權者通過例外狀態，把法內的人變成法外的人，即赤裸裸的人。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裸人一無所有。裸人是從無產階級演化出來的概念。

古希臘哲學的生命概念由兩個詞彙構成：自然生命 (*zoe*) 和政治生命 (*bios*)。在此基礎之上，本雅明引申出「裸命」這一概念。裸命是生命政治和生命律法內或外的一種特殊現象，它是例外狀態給出的一種生命狀態，介於自然生命與政治生命之間。裸命是現代政治建構的基本單位，處於法內和法外生命管理的底層。主權者利用例外狀態把政治生命轉化為裸命。裸命受到法律的規範，但是被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

在法制社會，主權者擁有立法和護法的權力。主權者同時是法內之人，需要遵守憲法和法律的規範。但是，通過宣布例外狀態，主權者可以把自己置身於法律之外，無需通過立法機制，即可頒布法令，管理生命。在例外狀態下，個體為了保存

自己的生命，寧願放棄對正義的追求，淪落為沒有權利、沒有尊嚴、只有義務的人。現代法律給予工人罷工的權利，即給予工人革命的暴力。但是主權者可以利用例外狀態法，解除工人叛法的權利。為了維護穩定的利益，主權者一有機會就會使用例外狀態法權。

本雅明認為，存在不應是赤裸裸的生命存在，不應把存在看得比幸福和正義的生活還要高。只追求赤裸裸的存在，是錯誤而低俗的。個體應該追求高尚和正義的存在。阿甘本的「例外狀態」理論受到本



人們渴望安全，於是接受了政府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讓人們產生這種渴望，並採取措施加以滿足的，恰恰也是政府。圖為在意大利封城令下，羅馬居民在家中的露台做簡單的健身運動。（明報資料室）

雅明思想的影響。他對意大利政府防疫措施的批評，也是基於這種意識形態。

例外狀態

主權者如何通過例外狀態管理生命，是阿甘本哲學研究的主要問題。阿甘本指出，在例外狀態下，一切皆由主權者說了算，個體日常生活的權利和尊嚴被剝奪，變成赤裸裸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主權者不斷製造例外狀態，並把這種特殊的狀態變成生活的常態。

「例外狀態」一般是指社會生活中不符合政治和法律規範的狀態，如天災人禍。地震、颱風、洪水、蝗災、乾旱、饑荒和瘟疫等自然災害雖然是地區性的，但是災情引發的難民流動，也會影響其他地區的安寧。現代的人禍是貧窮、環境污染和戰爭的產物。地區性的貧富差距引發騷亂、內戰、人口遷移、恐怖襲擊、經濟蕭條、市場動盪和金融危機。全球化把地球變成一個村落，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世界各地都會有所感知。全球化不僅是經濟的全球化，也是天災人禍的全球化。區域性的例外狀態可以波及全球，層出不窮的例外狀態也因此成為世界的常態。

在遭遇天災人禍時，政府會採取一系

列的應對措施，嚴重時會宣布進入「例外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把自身置於法律之上，架空議會的立法機制，掌控立法、執法和司法權，形成一種獨斷專行的權力。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就曾利用製造騷亂（國會縱火案），宣布德國進入緊急狀態，把國家權力集於一身，建立了法西斯獨裁統治。

生命政治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他強調在城邦民主政治中，人的政治生命比自然生命重要。政治是手段，人是目的。政治是為人服務的。城邦政治是為了保存人的存在和善的實現。但是在現代國家中，「為保存人的存在而服務的政治」轉變為「管理生命的政治」。在《權力／暴力批判》一書中，本雅明指出，資本主義法制國家建立在「立法權力／暴力」和「護法權力／暴力」循環交替的機制上。法律的權力／暴力是用赤裸裸的生命作為工具，以此維護主權者的物質利益和政治的穩定性。

福柯受到亞里士多德和本雅明政治的影響。他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著作《性經驗史》中提出「生命政治」這一概念。福

柯指出，擁有權力，首先要佔有權力。古代佔有權力，依靠自身的武力。現代權力的佔有，首先是對金融資本的佔有，然後才是政治權力的佔有。佔有經濟權力，主權者就可以支配他人的肉體或生命。福柯認為，君主時代管理生命是「使人死或讓人活」，十九世紀以來則是「讓人活或不讓人死」。

君主管理生命的原則是，當個體拒不服從主權者的安排、危及主權者的安全或政局的穩定時，君主就會讓你死去。現代主權者把「生命權力」的「死亡威脅」轉變為「規訓權力」。這種權力保留了壓迫性和否定性的力量，如剝削、限制、阻礙、剝奪和摧毀，作為規訓權力的輔助措施。簡而言之，就是用生命的安全，來誘惑和威脅民眾，使民眾成為裸命和順民。

這種「讓你活」的措施，建立在恐嚇人心的機制上。個體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必須接受主權者對生命的規範和管理，即接受主權者對生命的規訓和調節。這種轉變表明，控制生命的最高權力與手段，已從對生命的殺戮轉向對總體生命的控制。福柯認為，生命權力的確立是資本主義發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能把對肉體的控制納入生產機制，無法對人口增長進行

調節，資本主義的發展就無法得到保證。

政治本應以人的生活為目的。一切手段，包括經濟手段，都是為生命服務。但是在生命政治中，政治的手段和目的被顛倒。為了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可以犧牲個體的生命、健康和尊嚴。異化的生命政治，變成經濟政治，不再為人的生活服務，而是駕馭和規範生命，為資本服務。

在探討防疫策略的道德哲學背景時，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也指出，在這場危機中，某些國家的政客很猶豫他們的策略是否需要依循一個基本法則：即國家應把努力拯救所有人的生命作為絕對優先，而不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去衡量達到這個目標是否會耗費不必要的經濟成本。

阿甘本對病毒性例外狀態的批評，主要是反對把例外狀態作為常規的政治範式。如果恐怖主義不再能成為宣布例外狀態的理由，發明一場流行病就可以為無限拓寬例外狀態提供理想的藉口。禁足令的頒布是為了防止因醫療系統崩潰而導致社會動盪。政府實施例外狀態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為了主權者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